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

●秦露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24年10月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围绕建设文化强国进行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提出的新命题。在主持这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把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原则落实到位,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在思想上、精神上、文化上筑牢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之后,当前,人类正在经历信息革命,这是我们建成文化强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时代背景。将“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列入“十五五”规划,体现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主动把握文化发展规律和执政规律、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高度文化自觉与历史自觉。

信息技术发展给文化治理带来新课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一场新的全方位综合国力竞争正在全球展开。能不能适应和引领互联网发展,成为决定大国兴衰的一个关键。”当前,新一代信息技术已成为各国间综合国力竞争的主战场,世界各国纷纷将信息化作为国家战略重点和优先发展方向,围绕网络空间发展主导权、制网权与话语权的争夺日趋激烈。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领域,技术竞争与风险防范同时成为国际关注重点。在全球主要政治体推出的人工智能政策中,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唯一被同时列入战略重点和风险重点的技术类别。

在经济领域,新技术不仅重构了传统产业模式,更通过算力算法算网的竞争重塑了全球数字经济格局,并成为全球产业链争夺的制高点,国际规则制定的主导权工具以及重构国际秩序的关键杠杆。在政治领域,信息技术的兴起催生了“网络主权”这一新型国家主权概念与战略空间,它超越传统地理边界,成为重塑地缘政治空间的重要力量。在文化领域,信息技术是意识形态

的主战场与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志。由此可见,信息技术在大国博弈中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对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更在于构建了“技术—权力—空间”三位一体的新型地缘政治体系。未来,掌握信息技术主导权的国家将在国际秩序重构中获得结构性优势。

信息技术作为新一代基础设施与社会结构的技术基座,不断推动信息获取、社交、舆论、电子商务、娱乐等多元应用场景的深度融合。互联网平台与资本共同驱动的内容生产模式互嵌,催生出新的经济业态与文化形态,在给社会注入新活力的同时,也给党掌握文化领导权带来了全新的课题。提升信息化条件下的文化领域治理能力,需要在这样的背景下加以理解和定位,才能在发展与安全、管好与用好的平衡与统一中把握好“治理”的深层内涵。对此,需要重点关注以下新课题:

一是网络平台中介化与“黑箱”化。当前,互联网商业平台日益成为网民生产生活、获取信息、社会交往和参与公共事务的主要渠道之一。商业平台凭借“数据—算法—流量”的机制,掌握着推送信息、设置社会热点议题、影响公众情绪与言论乃至塑造社会观念与行为的权力。它们不但掌握了触动社会心理与情绪的重要开关,更成为当前热

点舆情生成的主要驱动力。但平台算法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得到充分有效的价值审核与法律监管,这影响了党从技术架构的源头掌握文化生态的主导权。

二是人工智能技术意识形态风险全流程化。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正日益成为意识形态主战场。人工智能大模型所具有的内生性“全流程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将在未来构成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重要挑战;其训练所用的语料库,可能存在意识形态与政治立场偏差及其他被污染的风险;其产生的大模型“幻觉”,即虚假与错误信息的大规模生成,成为各类谣言生产与传播的重要源头;大模型在训练和学习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可能被注入特定价值立场,进而影响认知框架的塑造。能否实现人工智能大模型内容输出的全流程可控,关系党主导舆论的话语权。

三是舆论引导与舆情处置面临新趋势。互联网时代,我国有超过11亿网民在同一个网络空间中获取与交流信息,当舆论密度与热度达到一定程度时,便会迅速演变为舆情,从而形成“信息传播—舆论聚集—舆情引爆”的效应。加之当前中文互联网已经成为全球不同政治力量与文化思潮争夺影响力和注意力的重要阵地,国内传播与国际传播之间泾渭分明的界限也早已不复存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否建立和完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成为党在文化领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

四是新兴文化业态IP化与粉丝化的双向剑效应凸显。数字技术与商业资本的双重驱动催生出大量新兴文化形态与业态,如粉丝经济、直播经济以及短视频网、网络文学等多模态的新大众文艺,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上中下游产业链,并推动形成企业全球化成长的新范式。这些新兴产业形态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丰富公共文化供给、促进中

华文化海外传播作出了积极贡献,尤其是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与创新活力,形成了新的“大众产销”与“全民共创”的经济形态与文化生态。但与此同时,其以粉丝经济为基础的IP运营模式,形成了以流量为核心的作品产销全链条机制,使网络平台通过流量分配权实质上掌握了产品分发权与生产流程控制权,影响甚至决定着哪些文化产品得以被创作、传播、消费,这给文化治理带来诸多新挑战。同时,文化创作的流量逻辑也强化了内容创作的同质化、浅表化、庸俗化现象。

以信息技术驱动文化领域治理能力系统性提升

在信息技术迭代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提升党的文化领域治理能力,应以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为中心环节,系统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生产经营机制。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方面着力:

健全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平台治理模式。目标是通过善治、善管、善用网络平台,将文化生产、传播、消费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党和政府手中,确保现实与虚拟、线下与线上两个空间中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畅通无阻。当前,需要将以内容治理为主的传统网络治理模式,升级为基于平台架构与算法治理的网络生态治理新模式。对平台架构与算法进行前置审核与监管,确保算法导向正确、公平公正、公开透明、自主可控,从根源上解决算法“黑箱化”以及算法驱动下产生的“信息茧房”、诱导沉迷、操纵榜单、过度娱乐化等问题。同时,引导网络平台将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纳入算法优先推送序列,以此夯实网络舆论生态与文化生态的技术根基。

确保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的全流程可控。建立由多部门、行业、专家等联合组成的人工智能伦理与文化安全审核机制,对企业发展人工智能技术提供明确指导,从而构建起人工智能大模型全流程意识形态安全框架。在形成版权共识的前提下,建立“主流文化语料库联盟”,打通囊括主流媒体新闻报道、一流出版社出版物、图书馆馆藏等丰富内容的优质语料,实现“优质语料库—大模型训练”的正向循环。

实施积极的文化经济政策,建立健全双效统一的文化创作生产机制。《规划纲要》提出了“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生产经营机制,实施积极的文化经济政策,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旨在健全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依托国内大市场优势,通过双循环带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培育具有全球影响力和产业竞争力的优秀文化企业和品牌,推动文化繁荣,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为此,要完善文化产业“走出去”的中长期规划与一揽子计划,推动文化产业规模化出海。深化文化贸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数字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我国文化贸易主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与国际竞争力,以全球市场竞争力带动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探索构建“技术—艺术—文化”三位一体的新大众文艺评价与管理机制,将思想深度、艺术原创性等传统标准与文化传播力、技术创新性、受众参与度等现代指标相结合,推动专家评价、大众认可和市场表现相统一,形成更具包容性的立体评价体系,避免唯数据论。同时,鼓励和引导互联网平台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数据推荐与数据统计,进行内容审核与价值引导,确保党掌握对新大众文艺的技术生态定义权与文艺生产主导权。

持续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构

建一体化舆论综合治理体系。其目标,是通过系统性变革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整合各类媒介资源和生产要素,实现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管理手段等各方面的深度融合,打造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平台。《规划纲要》提出了“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提高主流舆论引导能力”的要求,这意味着主流媒体的发展范式必须根本转变,推动内容建设与网络管理、新闻宣传与舆论引导、虚拟空间与现实社会、国内传播与国际传播的整体相融。一是以数字与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媒体生产传播。拓展人工智能技术在创意策划、内容生产、信息处理、舆情分析等环节中的功能,重构媒体技术底座,驱动主流媒体系统性跃升。二是推动媒体融合纵向贯通与横向协同联动,形成互联互通、融合创新的发展态势,使各级各地媒体融合由局部探索转向系统集成。三是构建自主可控的新型传播平台。重点做好主流媒体内容数据、用户数据、公共数据的采集标注,并与政府的政务、服务、商务等综合性数据资源及渠道优势相结合。在为用户构筑坚实可靠数据底座的同时,嵌入数字生活场景,满足用户信息与服务需求,潜移默化地实现以文化人、价值观塑造与舆论引导等目标。同时,推进“常态化新闻发布—日常舆论引导—舆情应急处置”一体化治理。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实现从“信息发布”到“治理赋能”的功能升级;完善日常舆论引导与舆情处置协同机制,通过主流媒体、政务新媒体等平台形成常态化信息发布、互动与反馈,畅通政府与群众的良好互动渠道;等。

(据《光明日报》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文史教研部副主任)

深刻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三个基本问题

●于安龙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战略部署、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必然要求,是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的重要举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问题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根本遵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深刻把握这三个基本问题。

“为谁而树”是首要问题

政绩观是对政绩总的看法,包括对什么是政绩、为谁创造政绩、如何创造政绩和怎样衡量政绩等问题的基本认识和态度。它直接反映着党员干部从政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追求。政绩观的首要问题,是为谁干事创业、建功立业。在不同的条件下,政绩观有着不同的具体内涵和衡量标准,但是中国共产党人政绩观的核心要义是非常清晰明确的,即始终指向为人民出政绩。这是因为,共产党的政绩,说到底是要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人民出政绩,就是为人民利益而奋斗,为增进人民福祉而不懈努力。

政绩之本,在于为民。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所决定的,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所主导的。中国共产党人所追求的政绩,不是从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出发的政绩,而是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整体利益出发的政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干事业、创政绩,为的是造福人民,不是为了个人升迁得失。”坚持为人民出政绩,才能有效杜绝政绩冲动、政绩浮躁、政绩虚假等各种偏差,使政绩成果真正惠及于民、造福于民。

“树什么样的政绩”是核心内容

树惠民益民的政绩。权力为人民所赋,政绩必须为人民而创。共产党人干事创业,要以为人民造福、为人民谋利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多做于民有益、于国有功的好事实事。“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把为人民谋利、谋万世之利作为工作的目标和归宿,就会有干事创业的无尽智慧和无穷力量,就会自觉

抵制浮躁浮夸、贪功求名的不良思想和行为。自觉树立和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绩观,才能不务虚功、不图虚名,在务实担当、踏实有为中创造出让人民受益、让人民称赞的非凡业绩。

树利及长远的政绩。政绩观正确与否,关键要看它是否体现全面发展、符合长远利益。如果只顾眼前利益、局部利益,热衷于搞“短、平、快”的政绩,专干“显山露水”“表面风光”的事,而对涉及长远利益的基础工作漠不关心,无疑是一种错误的、短视的政绩观;如果只以GDP论英雄,把GDP的增长作为衡量政绩的唯一标准,而对百姓疾苦、民生福祉等视若无睹,则是一种片面的、扭曲的政绩观。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可能会得一时之利、促一时发展,但从根本来说,是以牺牲长远利益、整体利益换来的,因而难以持久。共产党人干事创业应多做打基础、利长远之事,多谋惠民生、增福祉之举,而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不计一时得失。一要“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不能为了快出政绩、出“显政绩”而忽视了党建工作;二要“坚持高质量发展”,不能只顾及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而忽视了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三要“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引导党员干部树立具有全面性、整体性的政绩观。

树经得起检验的政绩。一是要经得起群众检验。为官一任、当政一方,其政绩大小,是非功过,群众看得最清楚,也最有发言权。因此,群众是否认可、是否拥护是衡量政绩的根本标准,也是评判干部政绩观的重要标准。二是要经得起实践检验。政绩是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自然要由实践来检验。具体而言,就是要看所取得的政绩,是否符合客观规律,是否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增进人民福祉等。三是要经得起历史检验。所谓“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真正的政绩不仅在当下立得住,而且在将来也立得住。这样的政绩,才是真正的实绩、功绩、伟绩。

“靠什么树政绩”是根本所在

靠坚强党性树政绩。党性是中

国共产党的性质、目标、宗旨、作风、纪律、道德等各方面要素在党员身上的内化,并通过党员的行为体现出来的特性,它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础。党性强不强,关键要看党员干部是否有坚定的政治立场,能否始终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党员干部要加强党性锻炼、党性修养,不断坚定理想信念,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唯有如此,才能把廉政和勤政、为民和担当有机结合起来,以党性修养之“强”塑政绩观之“正”。

靠真抓实干树政绩。古人云:“天下事,以实则治,以文则不治。”古往今来,凡事皆兴于实、败于虚。任何业绩的取得、政绩的创造,根本来说都要靠真抓实干、埋头苦干、踏实肯干。崇尚实干、勇于担当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也是其百余年来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卓著成就的重要经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依靠实干而不断成长壮大的政党,也是一个依靠实干成就伟业的政党。毛泽东曾要求共产党员一定要有“认真实干”的精神,强调“实事求是,力戒空谈”。邓小平强调“少说空话,多干实事”,要求“领导者必须多干实事。”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实干兴邦、实干惠民,倡导党员干部坚持“实”字当头,“干”字为先,“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在不同历史时期,虽然面临着不同的发展目标 and 任务,但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倡导和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精神,在以实干推动发展、以实干赢得未来方面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十五五”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是需要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一个阶段。顺利实现“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要通过苦干、实干、巧干来实现,这也是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内党员干部出政绩、创政绩的根本途径。

(据《北京日报》作者系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

●燕连福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在十年前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演进,哲学社会科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回答好新的问题。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既是巩固文化主体性、坚定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中国理论解释力、中国学术原创力、中国话语影响力的重要路径。

以系统性专业性夯实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厦的基础,基础牢不牢,直接关系到理论研究深不深、学术创新强不强、话语表达亮不亮。

强化系统布局,构建协同联动的学科格局。学科体系不是简单的学科相加,而是相互支撑、彼此贯通的有机整体。十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不断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新闻传播学等传统学科持续发展,中共党史党建学、纪检监察学、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治理、国家安全、区域国别研究等新兴领域加快布局,学科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明显增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已基本确立”,但还存在“一些学科设置同社会发展联系不够紧密,学科体系不够健全,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比较薄弱”等问题。目前来看,一些学科之间仍有“隔墙”,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新兴学科与传统学科之间还没有充分“牵手”。推进学科体系建设,不能只看“有没有”,更要看“优不优”“强不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为牵引,推动基础学科固本、优势学科提质、新兴学科培育、交叉学科融合,形成布局合理、主干清晰、枝叶繁茂、协同联动的学科格局。

突出专业支撑,提升服务实践的学科能力。哲学社会科学不是在书斋里“闭门造车”,而是要观照现实、解释现实、引领现实。十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阐释理论的创新理论、服务国家治理、回应社会关切、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的生命力,正在于能够走进实践、解释实践、推动实践。但从现实看,一些学科

设置同社会发展联系不够紧密。有的研究问题意识不强,对重大现实问题回应不够及时;有的学科成果“自说自话”,服务决策、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的能力还不够强。必须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重大问题,锻造专业优势,提升解释能力,增强实践效能,真正使学科建设从“铺摊子”走向“上水平”,从“有体系”走向“强支撑”,让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基础更加坚实。

以主体性原创性建强学术体系

学术体系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筋骨和灵魂,决定着理论研究能不能站得住、立得稳、传得开。

坚持主体自觉,夯实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根基。主体性是学术体系建设的根本前提。没有学术主体性,就容易在别人的理论框架中解释中国;没有知识自主性,就难以真正讲清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治理背后的深层逻辑。十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更加注重从中国实际出发,不断推进概念提炼、理论概括和学理阐释,学术主体意识明显增强。但也要看到,有的研究仍习惯于用西方理论裁剪中国实践,有的满足于把国外概念“翻译”过来,把中国材料“装填”进去,对中国实践自身蕴含的理论创造重视不够。真正有生命力的理论,必须从本国实践和时代需要中生长出来。建强学术体系,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推进“两个结合”,把中国道路的成功经验、中国制度的显著优势、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转化为自主的概念、范畴和理论,真正夯实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根基。

突出原创引领,推出彰显中国智慧的理论成果。原创性是学术体系生命力所在。哲学社会科学不能只是跟在别人后面做注脚,也不能满足于对现实经验作一般描述,而是要在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中形成新的思想创造。十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理论创造的时代气象更加鲜明。但一些研究还存在“有材料缺思想、有观点缺学理、有表达缺穿透力”的问题,对实践经验的理论提炼还不够深,对重大问题的原创性回答还不够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停留在概念搬运、观点拼接和材料堆砌上,而是要从火热实践中发现真问题、提炼新概念、建构新理论。面向未来,必须把原创性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深入总结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推出更多有思想含

量、学理深度、时代高度的理论成果,让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更加原创”。

以标识性融通性优化话语体系

话语体系是思想理论的表达形式,也是学术体系的重要载体。再深刻的思想,如果缺少鲜明有力的表达,也难以有效传播;再丰富的实践,如果不能提炼为具有辨识度的话语,也难以形成广泛影响。

提炼标识性概念,增强中国话语辨识度。话语有没有力量,首先要看有没有自己的概念、自己的范畴、自己的表达。十年来,围绕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等重大命题,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不断提炼具有主体性、原创性、辨识度的标识性概念,使中国实践背后的制度逻辑、价值逻辑、文明逻辑更加清晰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思想要立起来,话语就不能软;理论要走出去,表达就不能弱。但现实中,一些研究仍习惯于用外来概念解释中国实践。有的表达概念不少、术语很多,却缺少中国味道、中国立场、中国气象;有的对中国实践的经验总结较多,对其背后的理论标识提炼不够。话语体系建设不能做概念的“搬运工”,而要做思想的“提炼者”。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从中国道路、中国治理、中国文化中提炼原创概念、核心范畴和鲜明表述,把中国实践中最有生命力的经验概括出来,把中国制度中最有说服力的优势揭示出来,把中华文明中最有穿透力的价值表达出来,不断增强中国话语的辨识度和解释力。

推动融通传播,提升中国话语影响力。中国话语既要“立得住”,也要“传得开”。十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学术交流、文明对话、对外传播中不断拓展表达空间,中国话语的国际能见度不断提升。但一些对外表达还存在着“自说自话”“内外脱节”的问题,有的习惯于国内文件语言直接转化为对外话语,有的重结论轻逻辑、重宣介轻互动,导致国外受众听不见却未必听得懂,听得懂却未必能认同。在国际传播中,既要坚持中国立场,又要尊重传播规律;既要讲我们想讲的,也要讲受众关心的。推动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大众话语有效转化,把深刻道理讲得深入浅出,把宏大叙事落到具体故事,把中国主张转化为国际社会易理解、能共鸣的表达方式。只有让中国话语既有思想锋芒,又有传播温度,才能不断提升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让中国表达更加鲜明、更有力量。

(据《学习时报》作者系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